



引用格式:刘顺,朱冬香.“红色”《共产党宣言》中的“绿色”伟力——兼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9-18.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3-0009-10

“红色”《共产党宣言》中的“绿色”伟力

——兼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mplication of revolutionary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lso talk about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刘顺¹, 朱冬香²

LIU Shun, ZHU Dongxiang

1. 上海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306;

2. 北京化工大学 学工部思政中心, 北京 100029

摘要:奠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红色”《共产党宣言》,在肯定资本的正面作用的同时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在追求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的互动耦合中建构了未来社会美好图景,其中还蕴含着深邃的“绿色”生态洞见。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内蕴的生态文明思想,正是“红色”《共产党宣言》的“绿色”续篇,不仅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新生产力论,还把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统筹起来,嵌入到从新时代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为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指明了方向、规划了道路。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

社会正义;

生态正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收稿日期:2018-05-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7YJC710051);北京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KDC026);北京化工大学课题(G-SZ-YB-201705)

作者简介:刘顺(1988—),男,河南省鹿邑县人,上海海事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生态问题;朱冬香(1979—),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客观理性地肯定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正面作用,写下了诸如“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1]36}这样的醒目金句。正是断章取义地抓住了这一点,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英国马克思主义左翼批评者特德·本顿、法国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迈克尔·洛维等就“证据确凿”地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唯生产力论”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尽管马克思很伟大,但因其始终高扬生产力大旗,强调利用人的力量不断突破自然的限制以期释放人的主体性,既缺乏对蕴含着强大生产力属性的资本逻辑的深刻生态批判,又没有揭露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所以马克思阙如生态思考,甚至成为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果真如此吗?奠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红色”《宣言》,难道真是马克思本人讴歌生产力力量而贬低自然界的“宣言书”了吗?事实上,“《宣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从未进行过系统论述的问题”^[2]。有鉴于此,本文拟探讨《宣言》中的深邃生态洞见,为作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作合理辩护,并希冀从经典作家那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找寻科学智慧和真理力量。

一、《宣言》在肯定资本正面作用的同时,深刻揭示出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

资本和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毕生的“敌人”,资本批判是其本人终其一生所从事的主要事业。同时,马克思是一位坚持科学精神和真理品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并没有简单笼统地从感情上把资本和资产阶级“一棍子打死”,而是从历史演进的宏大视野上理性看待资本逻辑

的二重性,并在客观肯定资本正面作用的同时,深刻揭露了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生态负效应。

1. 资本的正面作用:“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其一,资本为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奠定了基础。《宣言》第一部分毫不避讳地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36}在这段话中,资本主义的正面作用已跃然纸上。不难看出,尽管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十分憎恨给工人生产生活带来深重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他站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全局,肯定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3]。事实上,马克思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资本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正可谓“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4]288}。可以说,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无论是微观的电报使用、铁路轮船、化工在农业中的应用,还是宏观意义上的自然力的征服、人口的增加、整个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资本物化的生产力属性得以空前释放的结果,“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35}。这是资本正面作用的集中体现,它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巨大生产力。

其二,资本为新社会的出现创造了历史条件。相较于过去腐朽无能的封建阶级,《宣言》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33},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

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种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35},民族史将逐步嬗变为世界史。这种嬗变是以资本的文明作用为前提和基础的。“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5]90}不难理解,“资本的文明作用”是马克思基于资本主导的社会关系,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生产力发展所起到的正面引领作用而作出的深刻判断。资本创造文明的逻辑正是承载在“全面祛魅自然界”和“人的主体性得到空前释放”这两个层面之上的。此时,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实现了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物化作用。相较于以往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它“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4]927}。后来,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通过把资本主义社会同以前的其他社会形态相比,站在更高的平台上明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的一面。这与《宣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能量效应的客观肯定是一致的。

另外,《宣言》还从推动城镇化进程的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正面作用:“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1]36}这种有助于促进人的解放的“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摆脱,依靠的正是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和城乡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关系”^{[5]7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天然的优势。这种生产是以社会化、标准化和批量化的机器大工业为主轴的规模生产,可以说,在此之前还没有哪

一种力量能比它更加有利于激发和调动生产的活力。因此,《宣言》客观肯定了资本在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提高人的主体性进而实现包括改变农村愚昧状态的祛魅历程。

需要指出的是,《宣言》虽肯定了资本的正面作用,但并不是要把资本当作目的,而仅仅是把其当作手段。“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1]43}马克思认为,正像取代以前的社会形态一样,资产阶级社会自身也仅仅是历史的,因为其生产条件孕育了社会主义的因子,其迟早要遭到扬弃,“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5]110}。这一点也是资本正面作用的根本所在,为未来新社会迎来曙光和提供准备,“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5]69}。

2. 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凭借“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35-36}这意味着,资本家遵循自己的利益诉求来主导世界,把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布局到全球。由此就透射出资本逻辑固有的“任性”:罔顾自然界的内在律令,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意志来型塑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而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正在于此。

首先,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导致不良的生态后果。《宣言》明晰地指出,资产阶级从不会“安分守己”,不但要对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进行重塑,而且要“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34}。生产革命的不间断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基

石。“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34}当然,资产阶级推动生产变革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只是在客观上助推了生产力发展,满足了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甚至制造和操纵了“虚假需求”),其真实目的在于利用工人的异化劳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任何妨碍该目的实现的东西,就是资本和资本家的敌人,所以它们要摧毁一切妨碍生产力增长的“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5]91}。显然,首当其冲的便是处于“公地悲剧”中的生态环境,它根本抵挡不住资本物化一切的摧毁力量。“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工业资本主义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这种资本主义往往企图毁坏它自身从中获得原材料的土地。这种毁坏会一直循环下去,除非已经不存在土地(包括水和空气)支撑它盘剥。”^[6]显然,由此必然导致严峻的生态后果。

其次,资产阶级的经济理性遮蔽了人类的生态理性。《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1]43},并把诸如“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34}。“利润之神”成了高悬在资本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而其他包括工人和自然界在内的一切存在物都只不过是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资本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除了追求发财致富而别无他图,“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7]228}。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资本家倾向于用最小的成本置换出最大的收益,而这正是通过剥削工人和掠夺自然来实现的。对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马克思恩格斯有着血淋淋的控诉:“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1]46},他们无法企及任何

尊严,却“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揉”^{[8]205}。在掠夺自然界方面,资本家一方面罔顾自然界内在平衡规律而疯狂地掠夺开发,另一方面又大肆排放污染,千方百计地把破坏环境的成本转嫁给社会来担负。结果,自然界的先在地位和内在价值被瓦解得荡然无存。这种金钱主宰下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先在性地位的无情贬低^{[9]52}。可以说,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不但“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1]34},而且对自然界与人的共生关系予以解构和颠覆。在这种意义上,《宣言》深刻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理性已经僭越了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生态理性,生态危机的形成与出现势在必然。

最后,资本逻辑的空间化导致生态破坏的全球化。针对资本逻辑的横向空间扩展,《宣言》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1]35},最终“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36}。资本增殖具有时空的双重性:在时间上贯穿资本运动全过程,正可谓“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7]214};在空间上表现为“世界的资本”而非“地域的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5]169}。资本空间化不仅是资本增殖逻辑在经济层面的横向布展,而且是资本社会权力的空间化。帝国政治和殖民主义正是资本社会权力空间化的典型样态,资本不但试图控制被殖民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还大肆掠夺其廉价的生态资源。“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1]36},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本国之外寻找廉价的原料产地和能获取高昂利润的商品销售地。这不但造成被马克思批判的伦敦泰晤士河的严重粪便污染,而且把污染带到了全世界,造成地力损耗、森林消失,导致包括生态平衡在内的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135];来自西班牙的大农场主为了扩增种植面积,而不计对当地可能造成的生态后果,果断焚烧植被,留下了一片又一片的裸露岩石^[10]。这些便是资本空间化带来严峻生态问题的真实写照,其既带来生产力飞跃又对自然产生巨大破坏的“矛盾历史”被“写入了资本积累真实的地理学景观之中”^[11],生态问题就必然会伴随着资本的空间拓展由一国蔓延到全球。

总之,《宣言》在客观肯定资本的正面作用的同时犀利地揭露了导致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事实上,尽管生态问题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并非突出的议题,但资本主义社会始终都隐忍着双重矛盾即经济矛盾和生态矛盾^[12],只不过历史阶段不同,矛盾的侧重点会发生相应转移。“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137]《宣言》无疑是深刻的,源于私有制根源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愈发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被掘墓的中坚力量”,否则,就不会在激烈的国际博弈中,耗费全人类的精力去缔结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京都议定书》(1997)到《巴黎协定》(2016)等一系列世界性气候约定书^[13]

二、《宣言》在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互动耦合中建构未来社会

事实上,早在《宣言》之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基于社会和生态两个维度谋划了未来社会的美好前景,他富有激情地写道:“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同于自然主义。”那时,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双重矛盾将迎来双重和解,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冲突也将得到全面消解,

“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9]185-186}。“这种解答”最终有赖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革除资本权力对人类和自然界的统治和奴役。就像《宣言》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52}未来的理想社会正是在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的互动耦合中建构起来的。

1. “红色”的社会正义:消灭私有制

在《宣言》写作和发表之前,马克思就曾对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犀利深刻的批判:“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9]158}而造成工人如此凄惨生产生活场景的经济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宰社会关系的历史时代,社会正义的物质基座已不复存在。“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4]为了从根源上消除剥削进而实现彻底的正义,《宣言》认为共产主义的特征“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因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1]45},而旨在追求社会正义的共产主义是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图景由此被勾勒了出来。

马克思的社会正义理想主要是通过揭露资本家对工人惨绝人寰的严苛剥削而渐次展开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英国伦敦《评论家季刊》里面转引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一文中的语段来描述资本的贪婪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8]871},从谋求百分之十的利润到谋求百分

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所使用的手段也更加残酷和卑劣,无所不用其极。比马克思晚些时日的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经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直言不讳地揭露了早期资本家阶层受王公贵族奢靡风气影响的罪恶现象,并指出他们所享受的宫廷糜烂生活足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历史原貌^[15]。与资本家贪婪和纸醉金迷的生活形成截然对比的是,工人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最基本的生存要素诸如光和空气等,乃至连普通动物都较容易享受到的爱清洁,“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可以讲,不但是光和空气,就连工人的吃和住这两个最基本的生存要素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吃的是已经传染上“斑点病的马铃薯”,住的是臭气熏天、污染弥漫、声音嘈杂的“小爱尔兰”^{[9]225},他们蜗居在城市最糟糕的区域,“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9]411}。根本而言,资产阶级“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1]38},社会正义的愿景在资本统治的社会那里无迹可寻。

至此,就不难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为什么要把“消灭私有制”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前提条件了。他们认为,为了消灭剥削和阶级对立,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45},进而才可能“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1]46}。只有消灭私有制,工人的生产生活境遇才能真正从根源上得以重塑,社会正义才能落地生根。

2. “绿色”的生态正义: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

《宣言》写道:“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

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37}这里的“魔鬼”不但包括工人阶级的持续抗争、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经济危机,而且也包括后来逐步袭击全球的生态危机。资本家“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1]46}。资本的抽象权力满足了资本家阶层的贪婪,却造成了工人生产环境的急剧恶化。这不但影响了劳动力的可持续性供给,而且也蚕食着自然生态的承载力。可以说,正是资本和资本所有者的贪婪制造了人与自然之间“文明的阴沟”^{[9]225}。要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与共生,必须解构并终结资本对工人和自然界的双重剥削。

立足于根深蒂固的资本权力,资产阶级索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34}。自资本诞生以来,它“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871}。马克思对资本作出这种最直白但充满着原则高度的批判,直斥资本已把剥削内化到自己骨髓之中的本性。资本为了增殖,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其惯用途径,而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越多,工人就会变得越贫困,就越会失去自己的主体性和自为性,进而沦为资本家私人财富的工具性存在,身陷于“抽象统治”而不能自拔。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工人自身的劳动成果却成了他们正常生存发展的最大桎梏。劳动的异化又带来了自然的异化。作为人类基础实践活动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进而实现新陈代谢的媒介。但资本家正是利用工人异化了的劳动,最大限度地从自然界中掠夺资源,肆无忌惮地向自然界排放污染。可以说,工人从自然界中开发的资源越多,资本家的私人财富就会跃升越快,但相反工人就会越没有力量。

因此,只要不彻底变革资本统治的社会关

系和瓦解资本通约的价值规则,生态正义就难以实现。人类文明的最大挑战将是肇始于资本增殖的人类自我异化(劳动异化)和世界异化(自然异化),不解决这种源自私有制的“二重异化”,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只能是幻想^[16]。根本而言,《宣言》关于消灭私有制进而构建未来社会的设想,正是对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与自然矛盾和解”思想的深度阐发。

3. “红绿”耦合的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

《宣言》前瞻性地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红绿”耦合的未来社会,就是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在这种联合体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928}。马克思在此处强调的是,如何在社会成员平等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合理新陈代谢,既避免自然界成为主宰人的“最高之神”,又防止人类自私无度地蹂躏自然界,答案就是“平等占有”“联合生产”“最小消耗”和“共同控制”,这既契合自由人的本性需求又不违背自然界的内在规律。“马克思的红色思想又是与绿色观点结合在一起的。”^[17]“红绿”耦合的社会愿景由此得以成为可能。

要建成这种“红绿”耦合的自由人联合体,首先要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自然的社会化,也就是要使社会革命与生态革命同频共振、交融一体。多位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反复援引《宣言》中响彻云霄的金典名句“消灭私有制”,来展露其对资本主义私

有制的生态批判和人类深陷生态灾难泥淖后的未来出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站在更高的社会形态上观之,某个人之于土地的私有权,与一个人要自私地控制另外某个人即占有对他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4]878}。自然界的私有化,意味着把自然界的所有权和开发权完全转给了内嵌着增殖和效用双重原则的资本。资本家为了在既定预期内收获最大利润,必然倾向于采取最娴熟的手段来掠夺自然界和剥削工人,根本不会去考虑所谓的生态平衡和工人福祉,因为任何可能抬升资本成本的行为都会被规避。《宣言》发表之后的100多年里尤其是迈入新世纪以来,西方世界遍地开花的环保运动和劳工运动等,“雷声大雨点小”,收效甚微以致无疾而终。这表明,生态正义和社会正义的“风暴苗头”虽已显现但尚未形成气候。单维度的“绿色”生态运动或“红色”劳工运动都难以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普遍抗争。

《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42}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至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生态问题愈发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而成为关涉全球人类的议题,但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问题或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更高层级的“政治问题”^{[13]38},一个关系到绝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生存或毁灭的元问题。“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1]37}当下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进行的环保运动与传统意义上延绵不绝的以“劳资对抗”为主题的社会运动,若归一合流、共同发力,一起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人类就能不断超越资本的限度、摆脱资本的宰制而走向普遍自由。只有一

方面消解人类的自我异化,另一方面消除世界异化,才能爆发出时代最强音。这样,既能解决关乎人类存亡的环境危机,又能消弥造成人与人之间深层不平等的社会矛盾,实现马克思毕生追求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和解,到那时“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1]50},自由人联合体必定不再是愿景而是确证的现实。

三、“红色”《宣言》的21世纪“绿色”续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18]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宣言》穿越时空的科学伟力、时代价值和战略意蕴的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18],作为21世纪卓越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典范的习近平,其生态文明思想正是“红色”《宣言》的“绿色”续篇。

1. 新生产力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中共十九大将“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总纲,其重大历史意义毋庸置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19]544}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都高屋建瓴地反复要求:务必稳妥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二者是今后工作中发挥基础作用的“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它们要相互促进、同频共振,决不能顾此失彼。他还强调,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20]209},“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9]210}。不难看出,新时代生态文明追求的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协同进步,而非偏废其一的生态至上或生产力至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英明论断,实质上反映出我们党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应该维持怎样的合理关系所持的基本态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忽视环境保护而过度去搞生产力发展就是毁灭式的“竭泽而渔”,但同时不抓生产力发展、妄谈生态保护,也必定是空洞无物的“缘木求鱼”。正是基于这样的发展经验,有必要对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作出与时俱进的新概括。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仍是解决当代中国重大问题和关键难题的头把钥匙,仍需积极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当代发展又必须是具有充分“含金量”的绿色发展,尤其要把生产力的创新形态和绿色内涵贯穿到现代化经济体系之中,积极发展自然资本,即“要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19]210}。《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也明确指出:要“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充分认识到“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应得到合理回报和经济补偿”^[21]。这说明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仍需要基于发展大局而不断创新生产力的科学内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英明论断,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高政治宣言和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把改善生态环境升华到等同于发展生产力的原则高度,正是与时俱进地传承了马克思“自然生产力也是生产力”的生态

洞见和思想智慧。有学者认为,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22],是崭新的具有时代感的“保护生产力新理念”^[23]。总之,我们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既契合社会发展阶段所需又注重生态平衡所求的“协调统筹论”。在“从求温饱到盼环保”已成为显性的普遍人民诉求的新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新生产力论巧妙解决了这样一个世界难题,为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与生态良好之间如何实现“非零和共存”与“友好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

2.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有机统一的生动范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上明确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24]⁵²,这种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型文明道路的呈现,“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4]⁵⁰。从“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美好生活”到“生态产品”“优美生态”这些关键词,便可管窥出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既观照物质精神层面的美好生活需要又兼顾宜居宜业维度上的优美环境诉求,换言之,就是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把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和谐互动、共融共生、协同推进,“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0]⁹⁵。

尽管历史自会开创新的道路,但最关键的几步又总在意料之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瞻远瞩、锐意破局,无论是在指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中还是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始终把社会公

平正义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就社会正义而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出卷人、答卷人和阅卷人”来明确执政逻辑、以“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机会”来重构利益分配格局,最终以铁腕反腐、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为社会正义托底保障。就生态正义而言,习近平总书记秉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鲜明理念,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将生态环境视为“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25],将生态环境质量视为小康全面不全面的关键^[26]。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实践中,二者同频共振、交互一体,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统筹考量,嵌入到新时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不断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M].刘仁胜,李晶,董慧,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93.
- [3]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73.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FOSTER J B, CLARK B, YORK R.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8.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 [11]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初立忠,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3.
- [12]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M]. 唐正东,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3-259.
- [13] 刘顺.“杰文斯悖论”:资本逻辑宰制下技术的生态幻象[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9):33.
- [14]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
- [15] 维尔纳·桑巴特. 奢侈与资本主义[M]. 王燕平,侯小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5-160.
- [16] FOSTER J B.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9:271.
- [17] 方世南. 把握马克思“红绿交融”的思想光辉 [EB/OL]. (2018-05-11) [2018-05-20]. http://www.gmw.cn/xueshu/2018-05/11/content_28748996.htm.
- [1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18-04-25(01).
- [1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C].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C].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2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N]. 人民日报,2015-09-22(14).
- [22] 龚万达,刘祖云. 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学习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J]. 教学与研究,2015(3):35.
- [23] 顾海良. 让世界分享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N]. 光明日报,2015-10-08(16).
- [2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5]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N]. 人民日报,2018-05-20(01).
- [26] 习近平谈生态文明[EB/OL]. (2014-08-29) [2018-05-20].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829/c164113-25567379-4.html>.